

# 乾隆年间棉花进口危机

松浦章

**内容提要:**中国丝绸自古就是制衣原料,而棉花作为新兴制衣原料在明代才得以广泛普及。至清代,棉花通过广东出口至欧洲。乾隆年间,棉花从原来的出口状态变成依赖从海外进口。时任云贵总督并通晓广州贸易状况的李侍尧得知缅甸盛产棉花,且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从印度等地把大量棉花进口至广东,故建议禁止从这些地方进口棉花。清政府为此采取了禁止通过广州从国外进口棉花的措施,但棉花还是会从印度进口,并持续稳定地占据广州市场。

**关键词:**清代 中国 缅甸 棉花 外洋船

## 一、引言

中国从10世纪左右才开始种植棉花,在此之前制衣原料一直是以丝绸和麻为主,而棉花种植之前的诸多状况尚未探明。11世纪以后,棉花作为制衣原料为大众所熟知,这时种植的棉花为多年生树棉(*Gossypium arboretum* L.)。至12世纪,一年生棉花(*Gossypium herbaceum* L.),因种植便利得以迅速普及。<sup>①</sup>

之前有很多关于中国棉花、棉布生产史的研究成果,如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等,但这些成果主要关注中国国内棉花和棉布的生产问题,很少有人关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从国外进口棉花的状况。本文主要通过清朝官员的奏折来看乾隆时期从国外进口棉花的状况以及所采取的禁止进口措施。

日本明治时期,由驻中国的领事上野专一整理的《支那贸易物产字典》中记载:紫花布,即南京木棉,在中国关税项中称作“各色土布”。它的外文名称为“Nankeen”,这是因为这种木棉布最初的生产地是在南京,故以其产地命名。不论是出身高贵的人,还是普通的劳动者,当时中国人的内衣全部用棉布做成,所以土布的需求量很大;或染成蓝色,用于外衣。而以江苏省产的紫花布最为上乘。<sup>②</sup>这种棉布在海外也广为人知。然而,作为棉花生产和棉布制造大国,中国还要通过广东贸易从印度进口棉花。<sup>③</sup>乾隆年间,本应把中国产的棉布出口至世界各地,却变成了从海外进口,这让当时的官员大为苦恼。

## 二、中国棉花生产的发展

关于中国棉布的普及情况,明代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22《贡赋之常》中记载:

---

[作者简介] 松浦章,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本文译者马成芬,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日本关西大学博士。

① 森鹿三「中国の衣食の歴史地理」森鹿三『東洋学研究 歴史地理篇』,東洋史研究会,1970年11月,436、452頁。

② 上野專一編『支那貿易物産字典』丸善书店,明治21年4月,179頁。

③ 田中正俊指出:1704年尝试把印度产棉花出口至厦门,至1780年后期,印度棉花的进口量大幅增加,占据了广东进口商品的首位。此著作中提到了东印度公司与棉花进口的关系,但对于中国国内状况没有涉及。『中国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说』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7月,132—134頁。

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笔者注:明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泉,盖百倍焉。<sup>①</sup>

中国古代的衣料主要有丝、麻、葛、褐四种。“丝”为生丝,从蚕茧中提取纤维丝,把丝织成布。“麻”指的是从大麻、苧麻、黄麻、亚麻中提取纤维制成麻布。“葛”指的是用豆科的多年生草蔓纤维织成的葛布。“褐”一般称作粗布。汉代及唐代人一般用以上四种衣料做成衣服。至宋、元两代,从海外经陆路把棉花种子运往西北的甘肃、陕西,通过船舶经水路运往福建、广东等地,棉花才开始播种、种植,而用其制造的棉布得以迅速普及。至明代,棉花种植更为普及。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30《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中记录:“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sup>②</sup>可见江南棉花栽培的普及与黄道婆自海南岛来到江南有直接关系。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中关于黄道婆的记载亦说明棉布的纺织技术已流传至松江府的乌泥泾:

闽广多种木绵,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棹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计就殷。未几,姬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sup>③</sup>

明代谈迁《枣林杂俎·智集》中有关于棉布的记载:

成化间,松江人以布饷贵,近流闻禁庭,下府司织造赭黄、大红、真紫等色,龙、凤、斗牛、麒麟等纹,胥隶并缘为奸,一匹有费白金百两者。孝宗在东宫深知其弊,即位首罢之。尝阅内帑,见之曰:此布一匹,文绮十匹价也。终身不一御,自是遂绝。松江细布输京十二万三千八百六十匹有奇;华亭六万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万二千七百七十匹有奇,青浦二万三千四十匹有奇,万历初加八千匹。<sup>④</sup>

成化年间(1464—1487)明朝廷流行棉布,一匹价格约白金百两,孝宗为皇太子时就深知成化年间“以布饷贵”之弊害,即位后遂罢黜其害。16世纪后半期,从松江府运往北京的棉布有12万余匹。其中,华亭6.5万余匹、上海4万余匹、青浦2.3万余匹,江南成为棉布的主要产地。

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7中记录了上海地区棉布的生产状况:“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粳稻等。”<sup>⑤</sup>叶梦珠的故乡在上海近郊地区,盛产木棉,木棉的栽培甚至与水稻种植一样普遍。因此,此地生产的棉布及当地固有高级产品被纷纷运至各地。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① 丘濬:《大学衍义补》,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310页。

② 赵翼:《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42页。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7页。

④ 谈迁:《枣林杂俎·智集》,《笔记小说大观》正编第3册,新兴书局1973年版,第1616页。

⑤ 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sup>①</sup>

上海近郊生产的棉布有三种，尤其以称作“标布”的棉布质量最好，主要销往陕西、山西、北京周边等地。之后盛行的是比“标布”稍细长的“中机”，流行至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在牙行当中，甚至出现了争抢布商以蓄财者。

关于江南制造棉布的状况，钱泳《履园丛话》载：“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邻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娇艳绝人，常以布来换棉花，焜常多与之，并无他志也。”<sup>②</sup>十年后，钱焜因破产流浪至北京，救助他的正是之前去棉庄换棉花的小姑娘，那时她已经嫁入大户人家。钱泳记录的是乾隆初年的事，其时，棉布正是江南家庭妇女经常使用的布料。

当时的地方志中也常见类似记录。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载：“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可见从明末崇祯年开始，松江府以及城内盛行用棉布织成的床单。嘉庆《松江府志》卷5《风俗》载：“我松江风俗……至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红女有力焉。”<sup>③</sup>松江府乡村盛行纺织，农闲时期更盛，纺织主力主要为青年女子。

苏州李煦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九月的奏折中提到：“查今年四月内，奉户部行文，着令织造衙门采办青蓝布三十万匹，遵照定价，已经如数办足，解交户部外。但此项布匹出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人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sup>④</sup>户部所收青蓝布30万匹皆出自上海县人家，他们以纺织维持生计，不仅把织品上缴政府，还用此来养活一家老小。

不仅是棉布制造，加工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翥在奏折中提到：“有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二万人。”<sup>⑤</sup>显然，苏州也出现了染色的染坊、踹布工匠这种专业的工房和从业人员。这些从业人员都来自南京和安徽省太平府、宁国府等地，总计二万余人。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管江宁巡抚李卫等人在奏折中也记录了踹布工匠设立踹坊事宜：

细查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实……查苏城地方人众业杂者，莫如胥闾二门外，起自虎邱前后山塘南北濠，枫桥西园一带，为长、吴、元三县，犬牙相错之处，不但踹匠万余人，咸聚于此，而各省商贾帆樯鳞集。<sup>⑥</sup>

苏州阊门外有踹坊450余所，各坊工匠数十人，踹石约10900块，专业踹匠近1万人以上，可见当时棉布加工业之繁盛程度。<sup>⑦</sup>

中国所产棉布通过广州出口海外。<sup>⑧</sup>负责东印度公司贸易品的威廉·米尔布（William Milburn）记载：“中国出口至欧洲的南京棉布有宽幅和窄幅两种。东印度公司一般把宽幅的棉布称为Nakeen，这种布料最适合家庭消费，布料越精细越珍贵；窄幅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法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五》，第157页。

② 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3页。

③ 《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53页。

④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页。

⑤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版，第163页。

⑥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版，第748页。

⑦ 关于苏州踹布业的详细情况和踹布业历史的研究，参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東洋史研究会，1972年11月，337—410页；横山英『中国近代化の経済構造』亚纪书房，1972年3月，61—143页。

⑧ 关于清代广州海外贸易的研究成果很多，在范岱客著，江滢河、黄超译《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也有关于棉布问题的研究。

南京棉布加以使用。”<sup>①</sup>

马士(H. B. Morse)介绍了通过广州出口“南京棉”的状况。哈里斯号在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得知诺曼顿号于1736年在宁波的航行经历之后,便改变目的地,开往广州。最终装载了2740担茶叶、7750匹丝绸和9370匹南京布运往伦敦。<sup>②</sup> 哈里森号运往伦敦的南京布是诺曼顿号在宁波所购入,所以南京布很有可能是江南产的棉布。173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东商行——资元行(Young Khiqua)<sup>③</sup>处购入了茶叶、瓷器、棉布以及金等总计50348两。1739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沃波尔号与霍顿号在运往伦敦的货物清单里有“棉布513匹”,产地不明。<sup>④</sup> 1740年则由温彻斯特号和埃梅莉亚公主号两船购入“南京布4000匹”。<sup>⑤</sup> 在174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港脚船、法国、德国、瑞典、丹麦在广州的交易额中,只有东印度公司购入了15699匹棉布。<sup>⑥</sup>

在1750—1751年间,同样只有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购入了5740匹棉布。<sup>⑦</sup> 从1781年马士的记录中也可得知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购入20000匹的棉布运往伦敦。以现在的计量单位而言:每件棉布长约5.5米、宽约34.3厘米,单价0.4两。<sup>⑧</sup> 表1整理了1792年广州出口欧美的棉布数量及贸易额占比。

表1 1792年广州出口欧美的棉布数量及其贸易额占比

国别(船只数)	数量 (件)	贸易额 (两)	占广州出口各国棉布 贸易总额比例(%)	占各国进口贸易 总额比例(%)
英国东印度公司(20)	60 000	30 000	13.3	0.7
英国港脚船(20)	5 000	2 750	1.2	0.3
法国船(2)	228 000	114 000	50.7	31.5
瑞典船(1)	35 000	17 500	7.8	6.3
丹麦船(1)	43 000	21 000	9.3	9.2
荷兰船(4)	47 000	23 500	10.5	4.4
美国船(4)	27 400	13 700	6.1	4.3
热那亚船(1)	5 000	2 500	1.1	2.9
合计		224 950	100	3.0

资料来源: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I, pp. 203 - 204.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520—523页。

从表1可看出,法国是从广州出口中国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贸易额占法国进口贸易总额的31.5%。之所以如此大量地进口棉布,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之后,长裤成为市民阶层的新式服装,故而

<sup>①</sup> William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al Places in the East Indies, China, and Japan*, London: Black, Parry & Co. 1813, p. 514.

<sup>②</sup>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257. 马士著,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sup>③</sup>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

<sup>④</sup>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p. 27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272页。

<sup>⑤</sup>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pp. 274 - 275.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275页。

<sup>⑥</sup>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p. 282.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283页。

<sup>⑦</sup>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p. 255 - 292.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253—296页。

<sup>⑧</sup>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I, p. 257.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571页。

大量购求棉布。其次是东印度公司,其棉布出口额占广州出口各国棉布贸易总额 13.3%,但只占英国进口贸易总额的 0.7%。

清朝末期,以上海为中心,棉布生产大为盛行。王韬《瀛壖杂志》卷 2 记载:

沪土性宜木棉。若植禾稻,收成较歉,故播种者因地以制宜。郊原高旷,川泽沃衍,有潮汐之利以资灌溉,事半功倍。惟八月风涛浸啮,亦能为害。相传木棉一种,黄姬得自崖州,从海船携归,始教之艺。被其德者数百年,可谓远且溥矣。宜邑民之报赛无虚日也!……沪人生计在木棉,贩输远及数省,今则且至泰西各国矣。在沪业农者,罕见种稻。自散种以及成布,男播女织,其辛勤倍于禾稼,而利亦赢。乡人称木棉统谓之花。木棉有核,如梧子,较大。每年登场后,取棉花之衣厚核重者藏之。至明岁春间,轧取花核,四月便宜锄地种花。<sup>①</sup>

上海近郊的农村因土壤适合,棉花种植盛行。由棉花制造出的棉布不仅销往中国国内,还被出口至国外。江南的木棉布也叫“土布”,<sup>②</sup>通过清代沿海贸易输送至沿海各地。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地,且生产最先进的棉布,清代中国此时却从国外进口棉花,成为政府头疼的大问题。

### 三、乾隆年间依靠东印度公司进口外国棉花

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李侍尧最先提出海外进口棉花的问题。他在“筹制缅甸机宜疏”中提到:

伏查缅甸,自乾隆三十四年大兵围老官屯,懔駁势穷力蹙,情愿纳贡还人,吁请罢兵……臣留心察访缅甸物产,棉花最多,次则碧霞玺、翡翠玉,其仰给于内地者,不过绸缎贡丝铁针之类。近年以来,彼处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省售卖颇多,皆由内地每差土人摆夷出关探侦盘查,兵役因见官差要务,于随身行李搜检未严,夹带私走势所不免。究之侦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扞拾无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转将内地信息从而泄漏。至于棉花一项,臣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港脚船只进口,全载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买带些须白糖白矾,船多税少,颇累行商。臣与监督德魁严行飭谕,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国皆通,臣初不知缅甸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甸之晏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粤所见核之,在滇所闻缅甸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究不足以制缅甸之命。<sup>③</sup>

乾隆三十四年以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频繁发生国境纷争,却迟迟找不到解决纷争的方法。缅甸是棉花生产大国,并盛产碧霞玺、翡翠玉等玉石。因这些玉石产量少、价格高,很方便在离缅甸较近的云南、广东等地进行交易。乾隆中期也有很多中国人赴缅甸边境进行交易,边境检查也不那么严格。

以上记录的是李侍尧在广东任职期间的事情。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出身。<sup>④</sup>最初于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任广州将军;二十四年正月就任总督;<sup>⑤</sup>二十六年任两广总督;二十九年到三十年六月第二次就任两广总督;三十二年三月到四十二年正月第三次就任两广总督;四十二年正月到四十五年二月任云贵总督。<sup>⑥</sup>从就任经历可以看出,乾隆二十年到四十二年李侍尧一直在广州一带就职,十分精通广州的对外贸易。事实上,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即针对外国商人在广州的滞留期限、禁止广东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资金借贷等问题提出建议,“奏广东各国商船所集,请飭销货后依期回国,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24 页。

② 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说』177—189 頁。关于江南土布在东北的流通,参照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運業史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 年 11 月,207—217 頁。

③ 《皇清奏议》卷 62,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本,第 11 页正面和背面。

④ 《清史稿》卷 323《李侍尧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0817 页。

⑤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286—2290 页。

⑥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 2 册,第 1416—1429 页。

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行商资本,毋许雇内地厮役。”乾隆二十五年,针对外国商人贸易经费正常化问题,他又提出:“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于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应请删除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于此核销。并下部议行。”<sup>①</sup>之所以提出这些建议,是因为李侍尧觉察出当时来广州的“外洋脚船”在广州交易的货物几乎都是棉花,而归航时只带走税额相对较低的白糖和白矾,广州基本无贸易利益所得。这种状况对于广东商人来说是不利的。

《清高宗实录》卷1031“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戊午条”记载了李侍尧何时提出这些建议:

谕军机大臣等,李侍尧奏筹办缅甸边务情形,所虑亦是。已于折内批示。据称,缅匪屡以诡词欺诳,藉此窥我动静。其反复已非一次,甚为可恶。查从前定义闭关禁市,绝其资生之路,原属制缅要策。现在该酋来禀,亦吁恳开关。使生计果真窘迫,自当力图完局。因何屡有变更。兹悉心体访,缅地物产,棉花颇多。次则碧霞玳、翡翠玉。近年以来,彼处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省售卖颇多。皆由内地每差土人摆夷出关侦探。兵役因见官差要务,于随身行李搜检未严,夹带势所不免。究之所侦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无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转将内地信息从而泄漏。至棉花一项,臣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脚船进口,全载棉花,颇为行商之累。因与监督德魁严行飭禁,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等语……所陈悉中缅匪情弊,着传谕杨景素,会同李质颖、德魁于海口严行查禁。如有装载棉花船只,概不许其进口。务当实力奉行,勿以空言塞责。仍不时留心访察,如有胥役等受贿私放者,立即重治其罪。<sup>②</sup>

因上面记录中引用了李侍尧的“筹办缅甸边务情形”和“筹制缅甸机宜疏”,可知这是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且上谕曰:“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李侍尧奏筹办缅甸边务情形一折,所虑亦是,已于折内批示。据称缅匪屡以诡词欺诳,藉此窥我动静,其反复已非一次,甚为可恶。查从前定义闭关禁市,绝其资生之路,原属制缅要策,现在该酋来禀亦吁恳开关,使生计果真窘迫,自当力图完局。因何屡有变更。兹悉心体访,缅地物产,棉花颇多。次则碧霞玳、翡翠玉。”<sup>③</sup>可见,前面记事中引用的基本是李侍尧的上奏内容。关于这个上谕,还有如下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昨据李侍尧奏折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脚船进口,全载棉花,颇为行商之累。因与监督德魁严行飭禁,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地土产棉花最多。而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尤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等语。所奏甚是,业经传谕杨景素,会同李质颖、德魁于海口严行查禁矣。外洋海面处处皆通,因粤省各口查禁,复往他省混行入口,亦未可定。况内地处处出产棉花,供用极为宽裕,何藉取给外洋与之交易,致滋弊混。着传谕凡有海口之将军、督、抚,设法严行查禁,如有装载棉花船只,概不许其进口,务令实力奉行,勿以空言塞责,仍不时留心访察,或有胥役等受贿私放者,立即重治其罪。仍将如何设法查禁之处具折覆奏,将此遇各该将军督抚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sup>④</sup>

这些内容亦被引用在《清高宗实录》卷1031“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庚申条”中。<sup>⑤</sup>李侍尧在广东省

① 《清史稿》卷323《李侍尧传》,第10818页。

② 《清实录》第2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9—820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631页。

⑤ 《清实录》第21册,第823—824页。

任地方官员时,发现从海外来的“外洋脚船”(即外洋港脚船)都装载棉花到广东进行交易。当时粤海关总督德魁与李侍尧严禁此行为,如果发现棉花被混装在其他货物中,就直接下令此船舶返航。就任云南以后,李侍尧才知道缅甸是棉花的最大生产地,且“晏共<sup>①</sup>、羊翁等处”是外国船只的交易地,而缅甸棉花都是通过海上航路运输至广东的。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的“大学士仍管云贵”中记录了李侍尧的奏折,这条奏折是以“跪奏,为缅甸边务未结、敬陈一得之愚,仰祈圣裁事,窃臣荷蒙恩,命调任云贵总督……”开始的:

兹臣留心体访缅地物产,棉花最多,次则碧霞玺、翡翠玉,其仰给于内地者,不过绸缎黄丝铁针之类。近年以来,彼处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省,售卖颇多多,皆由内地每差土人摆夷。出关探侦、盘查兵役因见官差要务于随身行李,搜检未严,夹带私走,势所不免。究之侦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捃拾无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转将内地信息,从而泄漏。至棉花一项,臣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港脚船只进口,全载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止买带些白糖、白矾,船多税少,颇累行商。经臣与监督德魁、严行饬谕。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国皆通,臣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所以臣在粤所见征诸在滇所闻,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否则粤东近年何独骤多,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究不足以制缅匪之命,且递年镇将大员带兵数千驻守,非惟不成,事体而此局一日不究,一日上烦睿虑……<sup>②</sup>

该奏折的日期是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九日,如此可知李侍尧上呈奏折提出问题的时间。而乾隆皇帝下诏书是在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sup>③</sup>从呈请奏折到皇帝下诏书共经历了48天,参照当时云南昆明到北京的时间,已算是很快了。<sup>④</sup>

李侍尧的奏折指出了当时通过广州进口棉花的问题。根据马士记载,东印度公司船只里士满号(Richmond)于1735年把605件单价为8.5两(中国价格,以下均同)、总价为5143两的棉花运送至广东;<sup>⑤</sup>霍顿号于1739年从孟买把250包棉花运往广州;<sup>⑥</sup>昂斯洛号(Onslow)于1742年带来了870件单价为6.20两、总价为5394两的棉花;<sup>⑦</sup>荷兰船只于1750年带来了9768件棉花。<sup>⑧</sup>至1777年,贸易状况发生变化。乾隆帝从云贵总督处得知外国产棉花已被带入中国,所以下令禁止欧洲人把棉花输入中国。<sup>⑨</sup>《粤海关志》卷18《禁令二·棉花之禁》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圣谕:李侍尧奏,前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脚船进口,全载棉花。颇为行商之累,因与监督德魁严行饬禁,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等语。所陈悉中缅匪情弊,着传谕杨景素会同李质颖、德魁于海

① 晏共,即现在的仰光。参见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49页。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版,第309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658页。

④ 松浦章「清朝皇帝康熙帝の诹报と东アゾア世界」『或问』第16号,2009年7月,5(1—18)页。康熙皇帝的诹报从北京到昆明需要32日。

⑤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p. 238.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237页。

⑥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p. 265.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265页。

⑦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p. 283.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284页。

⑧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p. 292.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296页。

⑨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I, pp. 24 - 25.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346—347页。

口严行查禁,如有装载棉花船只,概不许其进口。务当实力奉行,勿以空言塞责,仍不时留心访察,如有胥役等受贿私放者,立即重治其罪。<sup>①</sup>

然而,为了继续开展广州贸易,东印度公司还是照常运行他们的船只,只是改变了交易方式。他们只保留一般账户,经常以预付款方式进行交易,账户余额也基本处于欠款状态。在1778年的进口货物中,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进口了7 020件棉花,而港脚船则进口了19 344件,<sup>②</sup>约是东印度公司船只的2.8倍。表2是1783年欧洲与中国交易的货物价格,从中可以看出印度产品输入中国和欧洲所得利益的高低。其中,棉花的利益最高。因此,与运往欧洲相较,运往中国获益会更大。

表2 1783年东印度公司经办的欧洲与中国的商品价格比较

物品名称	欧洲价格(两)	中国价格(两)	中国价格/欧洲价格
锡	15.00	17.20	1.15
胡椒	10.00	12.50	1.25
棉花	9.50	15.00	1.58
木香 <sup>1</sup>	18.00	23.00	1.28
鱼翅	18.00	24.00	1.33
铅	4.00	5.55	1.39

资料来源: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 p. 9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423页。

注:1. 木香是从印度的孟买进口至中国的,主要用于制药和烧香。

马士也记录了1785年及之后中国进口棉花的数量,参见表3和表4。

表3 1785—1794年广州棉花进口额趋势 单位:担

国名/船籍	年份									
	1785	1786	1787	1788	1789	1790	1791	1792	1793	1794
英国东印度公司	17 389	28 120	82 150	61 632	65 429	45 823	16 529	43 138	30 780	17 994
英国外洋港脚船	28 600	65 130	101 161	84 168	143 952	124 558	15 505	152 884	149 430	133 687
美国					17 411	1 432			9 363	4 964
法国						411		82		
和兰							273			2 209
丹麦	632	322								
普鲁士	983									
西班牙	798									
意大利(来亨)			4 000							
瑞典								5 452	4 600	
热那亚、托斯卡纳								2 302		

资料来源: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 pp. 111-256.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432—570页。

① 梁廷枏、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357页。

②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 p. 3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353—354页。



表 4 1795—1804 年广州棉花进口额趋势 单位:担

国名/船籍	1795	1796	1797	1798	1799	1800	1801	1802	1803	1804
英国东印度公司	4 929	44 955	77 445	39 483	63 709	90 764	38 571	49 287	69 228	59 751
英国外洋港脚船	130 363	118 668	127 287	144 756	64 122	147 222	15 619	112 151	214 959	170 200
美国	10 412	1 500					1 873		383	
丹麦		6 326	709	1 014						
西班牙		105								

资料来源: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I, pp. 266 - 416.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579—723页。

从图1可以看出1785年到1833年广州进口棉花的趋势。很明显,在数量上,港脚船以绝对优势领先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船,尤其是在1792至1798年这七年间。虽然之后公司船只与港脚船的输入量发生逆转,但在1826年之前,基本都是港脚船占据优势地位。1819年、1820年私人贸易出现,1827年取代港脚船,私人贸易船的输入量超越公司船只,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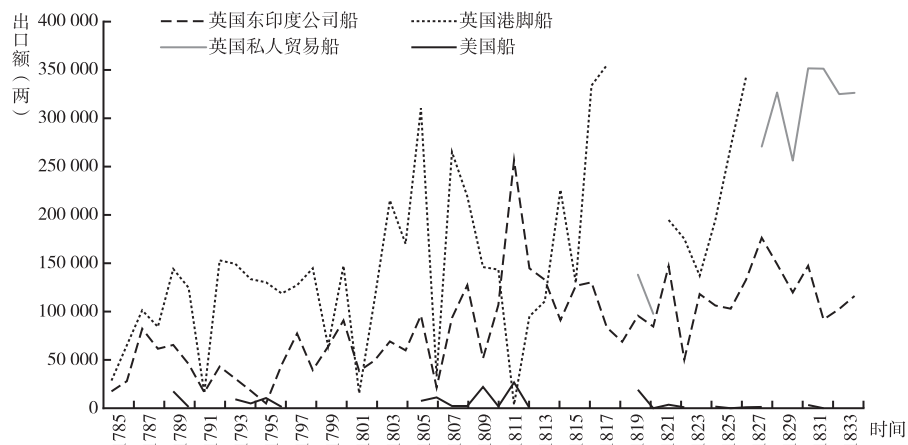


图1 1785—1820年广州棉花进口额趋势图

关于1834年广州贸易的记录显示:未加工的棉花由英国船只从孟买和孟加拉运到广州。这些未加工的棉花价格一般为每包9—13两。制成品方面,除了美国产衣料制品以外,棉制品主要是英国产的棉布衣料等。这些商品中尤其以鲜艳的高级棉布最受欢迎。另外,未漂白的宽幅布也比较受欢迎,亚麻布的需求量较少。广州使用的机制棉纱一般都是从英国和印度进口的,其中22支到45支规格的销路最好。这些棉制品的销售量逐年增长,说明中国人也逐渐开始采用这些棉制品,应该是开始看重国外进口产品的质量了。<sup>①</sup>

除了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从印度的孟买和孟加拉进口棉花之外,还从英国进口棉制品,因此,国外棉制品通过广州贸易逐渐渗透至中国国内。在19世纪中叶中国贸易指南中,威尔斯·威廉姆斯(Wells Williams)指出,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棉花,其主要品种是从孟买进口的软花或者软捆,也有从孟加拉进口的硬花或者硬捆,还有方包、四角捆等。1840年输入广州的年平均量为244 629担。其中,从孟买、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分别进口171 000担、35 677担和37 752担,占比分别为70%、

<sup>①</sup> “Articles of Import and Export,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from May 1833 to April 1834, second edition, Canton, 1834.

14.6%和15.4%。1847年与1848年从上海运来的棉花约5500担,其后几乎没再见到这种江南棉花。1851年由于棉花歉收,致使广州市场上的棉花价格高涨。1852年从印度进口了409213担棉花。但第二年的棉花消费量要比1841年以来少,只有147182担。这表明,一般情况下,广州市场的消费量不会超过这14年的平均消费值,即241548担。<sup>①</sup>而对于从中国出口的棉布,威尔斯记载曰:“南京木棉布也称紫花布或者赤布,这是外国人对南京产棉布的称呼。这种木棉布是由江南栽培的紫花棉织成,织机又以江苏省的为最优,种类繁多。虽然广东和福建生产的棉布品质较为恶劣,但中国的棉布在颜色和质感上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可超越的优越性。”<sup>②</sup>

#### 四、小结

与丝绸和麻相比,在中国衣料史上,使用棉花作为衣料应该算是比较晚的。棉布在明代才被人所知,至清代被作为高品质衣料进行加工,并通过广州贸易出口欧洲。由江南种植的棉花生产出来的高品质棉布被称为“南京棉布”。清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地,生产了最优质的棉布,但其时从国外进口棉花却成为让政府头疼的大问题。时任云贵总督并通晓广州贸易的李侍尧得知缅甸盛产棉花,并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把大量棉花从印度等地进口至广东,故建议要禁止从这些地方进口棉花。虽然清政府于乾隆四十三年实施了从国外禁止进口棉花的禁令,但棉花进口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多,这是广东的市场需求所导致的。

### The Import of Cotton from Foreign Products in Guangdong Trade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Matsuura Akira*

**Abstract:** Silk in China had been know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lothing for a long time, but cotton is known as a raw material for new clothing since around the 10th century, widely spread all over the Ming Dynasty, when it becomes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exported to Europe from Canton China. However, cotton imported from overseas into the Guangzhou trade during the Qianlong year, import is banned, but despite this, it is continuously imported from India by Guangzhou trade, constant consumption has become established in the Guangzhou market. It was. Therefo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of import ban on cotton flower and import of cotton flower during the year of Qianlong.

**Key Words:** Qing Dynasty, China, Cotton, Country Ship

(责任编辑:丰若非)

<sup>①</sup> Wells Williams,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sisting at a Collection of Details and Regulations Respecting Foreign Trade with China, Sailing Directions, Tables",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fourth edition, Canton, 1856, p. 148.

<sup>②</sup> Wells Williams,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sisting at a Collection of Details and Regulations Respecting Foreign Trade with China, Sailing Directions, Tables",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fourth edition, Canton, 1856, p. 180.